

民族研究參考資料

第十四集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基督教在滇、黔、川 交境一带苗族地区史略

杨汉先

编者的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研究工作遭到空前的浩劫。粉碎“四人帮”,使民族科研得到了新生。为了使民族科研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为民族工作服务。从现在起,我们将陆续选编有关贵州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作为内部参考。其主要内容有:

- 一、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 二、民间传说、故事、诗歌;
- 三、古籍文献摘抄;
- 四、专业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撰写的专著、论文;
- 五、名人传记和回忆录;
- 六、其他有关民族资料。

为了更好地保存资料,提供有关单位和个人参考使用,我们热切希望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料,使民族研究资料宝库更加丰富多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这个资料汇编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引 言.....	(1)
二、基督教传入前苗族的社会情况.....	(2)
三、基督教传入初期.....	(6)
四、教会迅速发展时期.....	(9)
五、教会维持现状时期.....	(19)
六、教会渐趋衰落时期.....	(21)
七、教会日薄西山时期.....	(27)
八、教会造成的民族隔阂.....	(33)
九、结 语.....	(34)

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简史

基督教是二十世纪初传入滇、黔、川交界一带苗族地区的，到解放为止，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苗族受其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十世纪初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日子，由于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接受了卖国屈辱的《辛丑条约》，这就更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而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也就大批肆无忌惮地深入内地和边疆传教，这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有力工具。最先传入威宁县苗族地区的是内地会，是由安顺县传入的，以后逐渐向赫章方向发展，势力不大，但为害极深。在同一时期，英帝国主义传教士柏格理，从云南省昭通县进入威宁县西北，教会初名圣道公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改名循道公会，本文所述的就是这个教会。循道公会在苗族地区布道范围相当宽，势力相当大，从威宁开始，扩大到云南省的昭通、彝良、永善、大关、镇雄、威信等县，以至伸展到昆明附近的嵩明、武定、禄劝等县一带的苗族地区。最后延及四川省的珙县、高县、筠连一带的苗族地区，合称为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石川联区。这个联区以威宁县石门坎为中心，教会兴盛时期教徒约达六万人，（包括未成年者在内）教会支堂约近五十个。本文所述教会历史，涉及云南和四川，但是以贵州的威宁为中心，其他各地所涉不甚详尽。另外，本文所指的“苗族”，主要是滇东北和黔西北一带的苗族，川南苗族较少。

基督教在滇、黔、川交界一带苗族地区传布了四十多年，它的经过也是复杂的，由于这些地区是民族杂居地区，除汉族外，少数民族以彝族、回族、苗族人口较多，加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基督教传入期间，资本主义的势力不断增长，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也迅速高涨，苗族人民在这样伟大的洪流中，必然要受到影响，它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突出点。

本文是根据一些苗族老年教徒口述，或笔记资料整理的，收集资料中，贵州省威宁自治县的领导同志大力协助。并且得到一些苗族同志补充校订，特别是张超伦、杨明光、王德光、杨忠德、张恩德等几位同志，出力最多，在这里一并衷心致谢。

本文力求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真实情况，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在资料的实详以及问题的分析上，难免存在缺点错误，敬请读者多加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二、基督教传入前苗族的社会情况

在叙述基督教传入的历史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苗族的社会情况，因为它对我们了解苗族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一) 苗族社会的生产力

根据苗族老年人口述的可靠历史，结合史歌和语言、生活习惯等来推断，基督教传入前（十九世纪末），威宁苗族主要是靠务农、牧畜、并兼有打猎等取得生活资料。农业技术是很低的，已经使用牛犁，但铁器农具全部是从汉族手中买进的，许多地方完全是刀耕火种，施用肥料极少，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广种薄收是十分普遍的。加以威宁地处高寒山区，产量是极低的。到解放前夕说的“种的一大坡，收来一大锅”，十九世纪以前的生产收入之低劣，就可以想见了。作物高山以洋芋、燕麦、荞子为主，山腰有包谷。水稻根本就没有。畜牧业在苗族里也较普遍，饲养牛、马、猪、羊的不少；他们都知道牛犁、马驼，山羊用作肉食，绵羊毛供给妇女制作衣服，或赶制披毡。猪、羊还可作肉食。手工业方面，作为商品生产的根本没有，家庭妇女自制自用的主要是麻布、毛线花衣、裙子等。木工也有人做，主要是自制自用家具，此外，就毫无其他手工业了。苗族用的陶器都是从汉族手里买来的，自己没有制陶器的工艺。苗族也没有石匠。苗族没有商品生产，也就没有从事商业的人，他们从乡场上买进的，主要是盐、针、线、铁制器皿、陶器用具而已，其他都是自给自足。苗族在数字计算上是很幼稚的，赶场不是每个人能够胜任。由于不熟悉汉语，数字计算又低，所以一个村寨只有几个人可以赶场，逢场时，这几个人就为全村寨包揽购买东西了。直到二十世纪初，未受基督教影响的一些村寨，二十多岁的人还不能够数上百位的数字，这就是生产力低下的一个铁证。苗族因为没有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上购买必需品时，往往用农产品直接交换，等于“日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原始交换方式。实际上，这些交换场所就在高山旷坝地方，根本就没有房屋建筑，而只有一些十分低矮的草棚，供给避雨遮阳的商人用而已。散场后，根本无人留下，豺狼虎豹便到场坝来觅找遗下的食物充饥，其原始的景况由此可见。由于苗族数字的运用很幼稚，加以贩卖商品的人多为汉族，在交易上难免苗族要吃一些亏，因此，给苗族造成了一种错觉：“汉人狡猾”，这种观念直到苗族有较多学生从基督教会的学校出来，能运用数字，并且多与汉族接触后，才逐渐减少。在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之前，苗族是极少进威宁县城的，据传，苗族要进城，“需要口里含着马屎”，这话的意思我们已经不可得知，当然事实不可能这样，但是说明苗族进城是极不容易的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歧视，使民族隔阂日益增加。另外到了十九世纪期间，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入我国，贵州当然也不能例外。十九世纪末叶，威宁县境就有一些地区开办银矿、铅矿，（现在的中水区、牛棚区等都有）这些矿区都在苗族村寨附近，矿厂工人和外地汉人大量增多，需要的农产品也大大增加，必然要向苗族摊购，对苗族必然有

压力，这就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因此，苗族对汉族很畏惧，不敢接触，他们说的“石头不是枕头，汉人不是伴头”，这句话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而是多年来形成的。由于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势力向威宁冲击，落后生产力的苗族必然要受到危害，例如封建买办在苗族地区以不等价推销商品和购买农产品，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二) 苗族社会的阶级分化情况

苗族绝大部分都种彝族土目大地主的地，有少数是种黑彝地主的地。苗族自己没有土地。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划分阶级成份，威宁全县苗族四千多户人口，没有地主，只有二户佃富农，中农也极少，绝大部分是贫农和雇农，所以十九世纪以前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十九世纪末叶，威宁地区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彝族的奴隶制度遭到破坏很深，但是奴隶社会的残余还很明显，彝族的土目官家原先就是大奴隶主，苗族原先全部都是他们的奴隶。威宁苗族称呼大奴隶主为“诺”，这与四川大小凉山称呼“黑彝”奴隶主是同音的。但是从苗族的历史传说中看来，“诺”似乎有更高统治者的含意，有“土司”或“土目”的意思。而苗族称“黑彝”为“阿芒都”称“白彝”为“阿芒等”，称“彝族”（总名）为“阿芒”。据苗族可靠的历史传说，他们是随“布诺”家的姑娘嫁到“骚诺”家来，是整个部落都来的。很显然，苗族是奴隶社会时期被征服的一个部落，是作为“布诺”大奴隶主的财产随其女儿嫁到“骚诺”大奴隶主家来的。后来因为汉族封建社会势力南下的影响，苗族已成为隶农或农奴。据二十世纪初期苗族老人说，在“诺”大地主的统治下，苗族是最低层的人，而“诺”自命为“五重天”以上的第一等人。“四重天”是大管事第二等人，“三重天”是大管甲第三等人，“二重天”是陆色陆巴（即管苗族的头人）第四等人，“最底层”是苗子，就是地底下的人。相传基督教未来前，苗族到大地主土目家去交租，别人都有地方住宿，唯独苗族没有，苗族交租者只得到牛圈、马圈空隙的地方睡觉。到吃饭时，大地主给苗族用的饭具都是喂猪喂狗用的家具，根本没有把苗族当人看待，而大地主的家奴用的饭具都比苗族用的清洁。可见苗族的地位是最低下的，是土目大地主压迫下的最底层。早年土目大地主对苗族是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的，即到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情况还保存着。基督教传入后，一次，禄家营（现在的龙街区马踏公社所属）补块土目地主把苗族朱彼得毒打几乎死去，肋骨断了几根，由于洋人传教士柏格理前去营救始得生还。一九二七年，我们亲眼见到一位杨姓苗族老大娘，被云南永善县的地主活活打死，并将租地收去，儿媳及孙女只好逃到亲戚家来生活（儿子早已死去）。苗族不但没有土地，即连所牧养的牲畜也不完全是自己所有权。所以二十世纪初期，苗族除了向土目大地主交地租外，还要交所谓的牛租、马租、羊租、猪租以至鸡租。另外还有最残酷的人租（当土目的家奴）。就是说苗族生儿育女都不能算自己所有，都是土目大地主的财产。尽管十九世纪末期，威宁县土目大地主和黑彝地主统治下的苗族社会，已进入封建社会阶段，但从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奴隶制的残余还是显著的。以上事实也证明了苗族原来是个被征服的部落，进入奴隶主辖地后，整个部落都成为奴隶，因而在苗族社会内是没有奴隶主，也没有地主和富农。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语言词汇里也可以窥见。苗语“奴隶”一词，多半都与“彝族”一词相连，即“彝族奴隶”，这很显然说明奴隶是彝族社会所有的，苗族社会就没有。同样“地主”一词，苗语多半也和“彝族”或“汉族”一词相连，即“彝族地主”或“汉族地主”，这也显然说明，地主是彝族社会或汉族社会所有的，

苗族就没有，这种用语习惯一直到解放时都如此。

(三) 苗族的婚姻和家庭

十九世纪末期，苗族没有与外族通婚的习惯。在苗族内部，实行同姓不通婚，血亲兄弟与姊妹间的子女也禁止通婚，他们亲属的称谓是这样：凡一个男子不但把亲生的子女称为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的弟兄（近亲远亲在内）的子女也称为子女，而被称为子女的都称他为父亲。同时一个男子也把自己妻子的姊妹们的子女都称为子女。同样一个女子把自己姊妹（近亲远亲在内）的子女和丈夫的弟兄们的子女都称为子女。而这些被称为子女的人都称她为母亲。孩子们称呼这些父亲母亲时只是用行列区别他或她，例如“大爹，二爹、三爹……，大妈、二妈、三妈，……等”。另一方面，男子称呼自己姊妹的子女为外甥和外甥女，他们或她们称这个男子为舅父。相反，一个女子把自己弟兄的子女称为内侄或内侄女，她被称为他们或她们的姑母。同时弟兄的子女都互相称为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也互相称为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女子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相称为表兄弟、表姊妹。基督教未来前，威宁苗族青年男女的关系比较自由，每逢节日（农历春节和端午节等）或农闲期间，月明之夜，青年男女都可以自由接触谈情说爱，苗语名称叫“踩月亮”，也就是旧书上说的“跳月”。当时苗族还有一种习俗，较大的村寨都有一个“宿寨房”，有一位年老妇女照管，这是供给青年男女恋爱使用的。基督教传入后这个风俗逐步取消，但少数未信教的村寨仍然保持了一段很长时间。

当时婚姻是男女双方提出的，同时也有由父母主张的。苗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没有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现象。但这个一夫一妻制不很巩固，结婚后女方便回娘家，她往往长时间的不到丈夫家去，待男方去带，女方才又回到男家来。由于男女双方往往有未婚前的情人，如果女方回母家后时间过久，她可能又与老情人接触，同样，男方也在婚后可以与老情人相会，所以往往结婚后的男女容易发生离异。如果女方在婚后长时间回娘家而男方又不去带，这表明双方都同意离婚，经过双方交谈后便离异，也不赔钱也不要其他的手续。一般是婚后女方怀孕，便易于在男家常往，如果婚后女方长期不怀孕，这就容易导致解除婚姻。婚后长时间女方不住在男家，旧名“不坐家”，如果女方到男方家来长住了，名为“坐家”。以上现象，十九世纪时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苗族的社会习惯是允许的。

另一个与婚姻有关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习惯，名为“吃平伙饭”（苗语意译），当地汉族称为“吃年饭”。就是每年农历过年时，苗族村寨未婚的青年女子联合，每人拿一份包谷面（有多多的可以拿多，有少的可以拿少），聚合在一起做饭，菜也同样的联合做。熟后放置在村旁人常经过的地方，凡外村未婚青年男子在此期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都要来村里唱歌谈爱，村里姑娘们，对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青年男子，便负责招待吃饭，青年男子不付任何报酬，这顿饭便名“平伙饭”。意思是共同筹集的，又是共同消费的，有“平均分配”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名词，与农历过年时，打猪所得野兽平均分配的名称完全一致，因此说明是原始社会一个残余，基督教传入后，此风渐消失。

(四) 苗族的生活习惯与思想意识

苗族社会生产力很低，生活很简陋，所以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与此相适应的。苗族是没有

乞丐的，一个村里如果有残废者，确实不能劳动的人，同族或亲友就负责把他养活起来。但在苗族社会中，对不劳而食的人，（体残者除外）是十分鄙视，最可耻的。苗语“乞丐”一词往往是和“汉人”一词相连用，就象“奴隶”和“地主”二词是与“彝族”连用一样。可见乞丐在苗族社会是没有。对残废人的抚养，在苗族社会里认为是当然的一种道德。同时非残废者参加劳动生产也是一种道德。

前面已经说过，农历新年打猎，平均分配兽肉的“平均分配”一词，也说明了这种道德观念，他们认为参与打猎者不管大人或小孩都劳动了，应该有份。

苗族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很幼稚，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有很多东西对他们是极大的威胁。例如大风、暴雨、雷电、疾病、各种天灾，以至于土目大地主的压迫等等，他们都认为是附有神灵，不能抗拒，只有唯命是从。基督教未来之前，苗族的村寨周围，可以发现不论大山、大石、大河、大树，以至奇形怪象的自然物旁，都残存有祀奉的食物。他们相信神灵妖魔充斥天地之间，但他们没有偶像，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总之一句话，苗族是崇拜自然的多神教，对自然界的灾难是无能为力的，对阶级压迫也如此。从苗语的“鬼怪妖魔”一类名词来看，就可以反映出来，足见其迷信的程度。因此苗族不但经济、政治上受深重的压迫，同时在精神上也是受着深重的压迫。由于生产力低下，所以衣、食、住、行极其简陋，衣服全是白麻布，兼有粗羊毛花衣，房屋多为茅棚，甚至有的人住在山洞、岩下，道路极其崎岖。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卫生，于是疾病很多，死亡率很高，这样一来，信鬼信神更为普遍。巫师巫婆呼鬼叫魂比比皆是，整个精神都被捆绑在这上面。因为他们对许多困难都无能为力，于是造成反抗思想也薄弱。苗族的历史传说或史歌中，除了较古的以外，较晚的都很少有反抗斗争的内容。苗族因为生产力低，他们在生产劳动中都是集体行动，养成了一种集体观念。例如，换工互助，团结、友爱，以及维护集体利益等等，他们都以为这是当然的事。苗族村寨里，不管任何一家受到灾难，或有婚丧等事，村里的人都会主动的来帮助解决。但也由于这些狭小的关系，所以他们与外界很少接触，除了奴隶主，土目大地主是他们的统治者，在交租服劳役上不得已而接触外，其他彝族、汉族中的被压迫阶层，他们也很少接触。在他们的错觉中，彝族是“凶”，汉族是“狡”。“凶”者，因为彝族奴隶主，彝族土目大地主残酷压迫剥削也。“狡”者，因为贩卖商品都是汉族，他们数字计算上熟练，自己不及也。因为苗族少与汉族、彝族中的被压迫阶层接触，于是造成了这种错觉。这也就是苗族狭隘性的一个原因，这种狭隘性直到解放时，都显然的存在着。

另外，我们从苗族的音乐、舞蹈，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意识状态，他们的歌曲，调子较为低沉，表现不开朗，不爽扩。这是长期在奴隶主残酷压迫下，只知道唯命是从，而不知道也不敢有反抗的表现。当然他们这种思想意识状态也是与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关系的，威宁地处高寒山区，平均海拔二千二百公尺左右，山高而谷深，所谓的“抬头朝上是白天，弯腰看底是夜间。隔山讲话听得见，走拢面前要半天。”多少年来多少代人的苗族，处在这样的环境，他们的思想境地也就不会开朗奔放了。但是，最主要的仍然是阶级压迫的原因，因为苗族长时期在奴隶主领主压迫的苦难日子里过活，没有什么喜乐可言，他们的思想状态必然是忧郁苦闷的。早年苗族老人说：“乌鸦没树桩，苗家没地方，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张。”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三、基督教传入初期 (1904年—1906年)

(1) 英帝传教士党居仁到安顺传教。1884年,英帝传教士白德礼到安顺老东门坡租房作传道所,1888年英帝传教士党居仁随之而来,这个教会名内地会。1894年白回英国不返安顺,于是党居仁全权主持。经二十多年之久,党因触电死在安顺。党在安顺共二十七年,曾三次回国,回国时有英笈及沃笈牧师代理,故党居住安顺二十四年。安顺的内地会曾发展到安平(今平坝)、宁州(今镇宁)、定南(今普定)、大定(今大方)、黔西、毕节、水城、威宁、赫章等县境。1903年,党居仁由安顺到普定的等堆(今之普定县补郎区)传教,凑巧有由威宁迁住郎岱的苗族张雅各、张约翰、潘隆碧等(这些名字是信教后所取,原有苗名今不可知)正在打猎,与党相遇。党见此数人穿着十分原始,梳长辫盘头上,穿麻布,背携弩,足穿草鞋,面极肮脏。党十分奇怪,于是询问同路的普定苗族,始知此数人系威宁县的苗族,他们自己没有一分土地,是讨种土目的地,生活十分贫苦,还打猎为生。党居仁与张雅各等交谈,并问他们愿不愿信教,如果信教,可保证别人不敢歧视,不敢欺侮。党并用热咖啡热牛奶招待。这些苗族原本是受人歧视欺侮的,现刻一见党对他们这样亲热关心,极其惊异。不几天,张雅各等又去打猎,打获一只野猪,不料被地主霸占去了。他们一向都怕外族人,不敢去追问,但如果作罢,生活就成问题。于是只有跑到安顺去找党居仁告以此事,党立即找县衙门报告了此事,县衙门便立即追查,将野猪还了张雅各等。此后,张等把这件事传出去,一直传到老家乡威宁县的新龙丁(今威宁自治县羊街区兴隆公社)。从此,兴隆厂附近的苗族不远数百里,多批去安顺信教。1904年(光绪三十年,龙年),党居仁见威宁信教苗族逐渐增多,并已伸展到葛布,(今之赫章县属),因此叫郎岱县兰龙桥热心信教的张雅各去葛布传教。张回安顺后,向党建议在葛布建立教堂,因葛布距安顺太远,来回太吃力。党考虑在葛布建立教堂一时不可能,但由安顺去葛布也确实太远。当即想到另有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云南省昭通县传教,昭通距葛布近多了,后来党找到一个名罗以理的苗族信徒交谈,给他一介绍信,叫他带去昭通找柏格理,请柏到葛布传教。党并向罗说明柏传的教与自己传的相同,罗于是携带介绍信于1904年7月12日由威宁到昭通找着柏格理。此后,柏虽去威宁境,但未到葛布,只在石门坎建立教堂传教。教派名圣道公会,与内地会不同。由于威宁苗族找到柏格理时为龙年(1904年),此后圣道公会(于1931年改名循道公会)苗族教徒便称:“龙年得道”。到1949年底解放为止,基督教圣道公会在威宁县一带苗族地区传教共45年,加上内地会传教史则为46年。

(2) 英帝传教士柏格理到威宁苗族地区传教。

1、先到云南昭通府。1887年英帝传教士柏格理和邵慕廉来昭通传教。据说此二人来昭通之前,曾有两个英帝传教士到昭通传过教,由于他们不能汉语,衣着又与汉族不同,受到歧视,无法住居下去,所以只好回英国去。柏格理、邵慕廉吸取先来者教训,他们到上海后,先去安徽省安庆学汉语汉文半年,然后安上假发(辫),穿上汉装,沿长江而上来到云

南省昭通县。二人在昭通集贤街租房居住并传教，但初时信教人数很少。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后不久，满清政府向帝国主义投降，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传教士仗传教特权，深入我国内地传教者日多。柏等有恃无恐，于是大胆与上层汉族人士接触，不久信教人数增多，且多为知识界人士。柏于是借此机会请人继续教其汉语汉文，自己则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并教授英语英文，由此柏与知识界交往日密而亲善。

2、柏格理第一次进入威宁境地。1904年夏，威宁苗族李马太、罗大以理和两个姓王的，由安顺携带党居仁介绍信直往昭通，阳晋七月十二日找到了柏格理。由于消息很快传出，八月里狮子洞附近，（按即后来的石门坎，当时石门坎尚不知名，此名系教会成立后传出的。）几个苗族又去见到柏格理，此后威宁境的苗族去昭通做礼拜的人渐多，远在二百华里都有人去。柏见到这种情况十分高兴。

1904年秋收时节，柏格理带着兴隆厂的那位苗族：从昭通取道去大官寨安荣之大土目家，（今威宁县小海区松山公社）、目的是找修建教堂的地基。未成功便到松林寨，又到狮子洞，宿一夜，便回昭通。

3、地主豪绅大肆造谣污陷迫害苗族。一九〇四年秋，威宁苗族到昭通县城信教消息迅速传到了威宁县属西北各地苗族村寨，苗族男女顿时络绎不绝去昭通县城聚贤街，找柏格理要求信教。人数由数十而数百以至千余。以往苗族是极少进城的，特别是妇女。现在这些苗族是从农村一百多里甚至二百里左右到昭通县城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星夜兼程去的，他们既不找人户住宿，又不寻找地方吃饭，由于这些行动极为突出，便引起了汉族的诧异、于是谣言大起、说：“苗族进昭通城，到洋人那里取药，拿来放在水井里毒死外族人。”又说：“苗族拿药去给人吃，人就会信教，如果不信教就要死。”这个谣言迅速的传开来，苗族进昭通县城所经过的道路，立马由地方的团防（相当于现在的区武装部）派人监守并捉捕苗族，一时惊天动地，不可开交。但越是禁止，苗族进昭通县城信教越多，他们越是采取风餐露宿的办法潜去昭通信教。苗族一向习惯于艰苦生活，挨冷挨饿他们是能够忍受的，因此夏秋之际他们不在人户住宿完全可以过夜，吃食是带有乾粮可以充饥。由于苗族去昭通信教人数不断激增，地方土豪劣绅便下令连乡场也不许苗族赶了，信教或不信教的同样遭受迫害，以至于被捉捕挨打挨骂。这样，有的苗族便深夜潜去昭通告知柏格理，柏立即请汉族教徒王玉洁和钟焕然写禀告到威宁县衙门，并亲自带着被打伤的苗族去官府衙门告状，请其出告示禁止坏人造谣污陷苗族，又请官府派人下乡解释，不要轻信谣言，务需安分守己。王玉洁、钟焕然并亲去牛吃水（河名）羊街，张贴威宁县衙门的告示。这时由于有个团首名李二林下毒手捆打重伤苗族多人，柏格理亲自前去讲理放出这些苗族，柏并将官府的告示指给李看，要他当众解说给群众听，经此一举，所有附近一带捆打苗族的地主也就放出了被关押迫害的苗族。因为当时正是官怕洋人，百姓怕官的势头。而各苗族村寨一见亲人被放回家，情不自禁的围到柏格理身边诉苦。柏走过了若干地方的苗族村寨，终于把迫害苗族的谣言压下去，而苗族见到柏格理的行动后，信教人数越来越多了，但土豪劣绅诬蔑柏格理和苗族为特务的谣言并未停止。

4、1905年建立石门坎教堂和住房。1905年正月初，柏格理第二次由昭通出发，去威宁大官寨土目大地主家，找修建教堂的地基。有八个苗族，并有昭通汉族教徒王老太爷、夏士元同去。经与安荣文土目交涉，他不同意给较平的地方。因该地有水塘及银洞，土目以为有

龙及金银宝贝故。有人提出狮子洞这个地方，柏格理询问了地形情况，安便同意以狮子洞给教会修教堂，柏便带了随同的人到狮子洞去。到苗族村寨找张武等了解情况后，又察看了地势，柏认为狮子洞太低，又狭窄，其后遂决定在狮子洞的西面。这里虽是有坡，但地势较高、较宽，可以发展，同时经了解此地是镇雄去昭通的大道，距昭通只有七十多华里，煤、水都方便，于是就决定在这里修教堂和学校了。

地基确定后，柏格理又召集王老太爷，夏士元和一些苗族教徒商议，如何进行修房。经研究，除母会出款外，苗族教徒可乐捐少许，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久即动工先修住房，因为有了住房才能工作。

5、1906年开始修建石门坎教会学校光华小学，修成后即招生读书。柏格理看到苗族教徒增加很快，经过两年时间的观察，看到苗族生活十分艰苦，受着土司土目大地主的沉重压迫，又受到异族欺侮。但这种人却比较诚实，争取为教徒是个机会。然而这种人很愚蠢，没有一点知识，胆子又小，要在他们当中争取教徒，应该培养他们自己的布道人员，而培养他们自己的布道人员的首要问题，就是读汉书。因此，1906年柏格理便决定在石门坎修建一所学校，这就是石门坎光华学校（初时只有小学，四十年代就有初中）。

柏派昭通汉族教徒王老太爷专负修建工作之责。木材是向附近彝族地主购买，人力是动员苗族自己负责，不久建成一幢正房，又建成两幢厢房。这时柏格理提出了“可以召集苗族子弟来读书了”。又命令苗族教徒朱彼得，杨雅各二人到各苗族村寨通知，叫子弟都来读书。随着王道元也和朱彼得、杨雅各到苗族村寨宣传读书及信教的事。这是苗族自己外出传教的第一次，也是他们开始读书的第一次。已往苗族很胆小，每外出都须有一位汉族先生带着。这三个人从昭通起程，经海角山（今中水区新华公社），顺苗族村寨，一路宣讲读书的事，经过云南彝良县境，又转入昭通县境，然后回到昭通县城。

6、选拔布道人员。柏格理进入苗族地区虽只二年多时间，但信教苗族增加极快，为了适应这种发展，柏考虑需要大量苗族负责布道工作，于是决定选拔一批热心教徒负担这项工作，并主持教会事务。选拔时通过与昭通的几个汉族布道员协商，这几个人到过苗族地区传过教，他们对苗族情况熟悉。最先参与工作的苗族杨雅各等也参加了协商。于是提出第一批布道员，共十六、七人，然后又从其中选出十二人受洗，此十二人就是将来负责施洗工作，他们就是负责一个地区的教会工作了。受洗人中女子二人。信教人数日益增加，已受洗者立即分赴各地各寨负责施洗工作，这样一来，形成了一股洪流。苗族原是好酒的，基督教传入后，提出禁烟禁酒，现时人人争取入教，除年迈者外，青、壮年几乎烟酒已经禁绝。苗族地区形成了一片读书声，唱歌声。这时苗族青年男女关系的混乱也被堵截起来，因为基督教的十条戒命中有一条说“不准奸淫”。顿时，信教的苗族地区，出现了一个新风气，与基督教来前迥然不同。同时现在因为取缔了祭祖、祭山、祭水、祭鬼等一系列繁杂迷信，学校开始讲述科学知识，破除多神的迷信，信教苗族深感思想上和物质上负担大大减轻，身心愉快的情景显著出现了。

由于选拔了苗族自己的布道员，语言上感情上完全吻合，于是布道效率更高，教徒人数更为增多，礼拜天做礼拜就有几千人。相继又选了二十多个布道员，现在全部已有四十多个布道员。这就大大加快了教会工作的发展，随着便进入了教会的兴盛时期。

四、教会迅速发展时期 (1907年——1915年)

(1) 修建大礼拜堂及学生宿舍

1905年开始修建石门坎教堂后，苗族地区闻风而来，情势之猛实为惊人。由于许多村寨离石门坎很远，来往做礼拜不方便，柏格理和首批教徒商议，分别建立支堂，然后派遣被选拔的布道员前去负责。这样教徒做礼拜更为方便，教会就更趋向旺盛。1906年建立了咪耳沟支堂(云南彝良县境)，以后逐年增加，有长海子(今威宁黑石区黑石公社)，大平子(云南永善县境)，拖姑媒(云南彝良县境)。以后相继建立的就多了。

石门坎虽在1905年和1906年修了教堂和学校，但礼拜堂和学生宿舍极需扩大，于是1907年继续修建大礼拜堂和学生宿舍。从昭通请来师傅设计安排，劳动力全部由苗族教徒负担，自带伙食，全尽义务。声势之大，苗族地区是已往没有过的。自愿服务的教徒，远及二百里以外的长海子，大平子。苗族信基督教的声浪传到了国内一些地方，甚至国外也传到了。这时云南的武定州(后改县)雪山一带的苗族听见了消息，也到石门坎来信了教。(距石门坎约七百华里，其方言同石门坎，并有亲戚关系如马爱福就是。)

(2) 创造苗文和翻译印刷圣经的经过。柏格理进入苗族地区后，随时随地注意苗族社会情况，为了利于传教，于是积极的学苗语，从1905年腊月起，柏便指定杨雅各为他的苗语教师，杨白天夜晚都不回家，专门负责教柏的苗语，不久柏制造出一种苗文，试用后不适用便放弃了。随后苗族布道员张武、王胜模和昭通县汉族布道员李司提文也参与研究创造苗文工作，李得柏的信任，且能英语英文，曾到过英国。几个月创造出一种字母，经多次修改，始成现用的苗文，即翻译《新约全书》的苗文。这时葛布内地会的党居仁也想制造苗文，他是用拉丁字母，后来柏格理，杨雅各，李司提文等造出的被试用了，党居仁造的未用，其后内地会苗族教徒也用的是石门坎的苗文了。苗文制出后便开始翻译《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这是第一次用苗文翻译圣经的尝试。这套文字是拼音字，分为元音和辅音，又名小字母和大字母，是用波拉字母造的，辅音字母在左，元音字母在右，以元音字母高低位置定调值。这套苗文很简单，容易学，但运用起来不准确，经常过猜，作用有限。制造这样的苗文，柏格理的目的是便于苗族容易学，能读圣经，唱赞美诗，增加教徒信上帝的虔诚。文字制造出后经几次修改，并经过教学运用，觉得可以用，才计划派人去外地作印刷工作。这套文字，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苗族知识分子杨荣新、王明基、吴性纯等曾作若干增补，因此此文字实际并非柏格理一人所完成也。

1915年柏格理病死，约一年后便派人去日本办理印刷苗文新约全书事，由英人王树德带杨雅各去，因为创造文字工作一开始是杨参加的，他熟悉情况，去联系印刷工作比较有利。1916年12月18日他们由石门坎起程，到昆明后照象办理护照，然后乘火车由安南去。一路经河口、河内、海防、到香港，随即去上海，又去日本，到横滨，就在这里印刷苗文。杨雅各在横滨住了三个月左右，这期间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又去东京游览皇城，并到其他地方参

观。杨雅各在日本看到了受沙皇压迫剥削而逃亡到日本的非俄罗斯民族，此时正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他们正准备要回西伯利亚，其状况甚为凄惨。杨雅各本是生活在生产、生活都很落后的苗族社会，同时从来又没出过远门，现在竟然来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很发达的日本，对他的感触很大，思想上影响极深，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苗族社会如何才能改变。

在横滨印刷苗文并校对完毕初印的少部分之后，杨雅各便买轮船票回到上海，当时正值张勋复辟。1917年夏，溥仪要当皇帝，正在混乱之中，所以轮船不许从上海启程，如须离沪，必需经严密检查。杨雅各便在上海停留了半个月，以后才坐轮船去香港，在港停半个月以后到河口。张勋复辟，云南也深受影响，进入中国境内的人被检查更严，杨雅各被拘禁半个月，并将其护照送往昆明查验，寄回后，才被释放回昆明，又回石门坎。杨雅各被拘期间，思想上受打击很大，他以为此生已经完结，因为当时受害被杀的人不少。杨经过这次风险，见了一次世面，对中国社会变化有了初浅认识。联系到1912年他在昆明遇马金长，马向他宣讲革命的道理，又有进一步的体会，感到苗族社会与外界隔离太远，长期下去不是办法。

经过到日本横滨联系之后，1919年，王树德又与杨雅各合作翻译了苗文《新约全书》，不久，排印寄来到石门坎，从此，苗族教徒便使用苗文《新约圣经》了。有了苗文圣经，许多苗族教徒自己学习，由于易于学习，不久许多人都能应用了。学这种文字不必专门入学校学，只要有人指导，自己都能学到手。它对写信，记账，记日记均有作用，许多不识汉文的人都感到很有用途，于是苗族成年人都普遍学起来了。不到十年，在基督教圣道公会的苗族地区，青壮年都几乎能够运用这种文字。后来有人还用它来翻译简略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但由于这种文字有缺点，所以未能达到目的。至于自然科学知识，这种文字就更不能适应了。

(3) 积极训练和培养传道人员。1908年，柏格理回国，便由张道惠主持教会工作，为了加快布道，决定集中一大批布道员来学习苗文，借学苗文的机会灌输这些人以基督教的教义。第一批来学苗文的有三百多人，其中有的是自愿而来的教徒，读了几个月便结业，经过选拔留下一部分作为布道员，余下全部回家，这是第一次训练布道人员。不久又召集第二批训练人数只约百余人，经数月便结业，选了少数留用。这是教会旺盛时期的一项训练工作。在训练期间，不单学了苗文，同时也加学汉文，因此，参加训练的人汉文水平也得到提高，当他们讲道时，苗文汉文都能用，大大扩大了使用范围。训练过程中，还加上一些简单的医药卫生和科学知识，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应用，许多人对此很感兴趣。

(4) 开办学校培养知识分子。1904年，威宁苗族第一次在昭通会见柏格理，他们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不洗脸，肮脏污秽，又脏又臭，很难接近，显然是一种原始愚蠢民族。但谈话当中，柏格理又察觉，这种人比较诚实，为了发展教徒，柏提出要他们读书，增加知识。柏想，这种人如果有了知识，可能信教就更忠诚一些。于是找了几个苗族到昭通集贤街，请来汉族教徒当老师，教他们读汉文。由于这些苗族又脏又臭又难看，一个汉族都不愿教。后来有一个勉强当了老师，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汉族老师发现，这些苗族并不象他原想的那样蠢笨，他们还是象汉族一样的聪明，并且很努力，不久已经学懂了不少汉文。这样就引起了这位汉族老师的教学兴趣，他也就更加认真的教起来了。逐渐老师与学生建立了感情，彼此互相信任，由于老师看到这些学生都比较老实忠厚，使他感到意外，于是，对其他汉族信徒，讲述了这些情况。

一九〇六年，修建了石门坎学校，随即召生正式开学。柏格理从昭通聘请汉族教师来，

教汉文读汉书，课本内容按汉族传统仍然是四书五经，后来又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启蒙课本教学。直到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建立了，政府通知全用共和国教科书，于是改用这种教本。经过五、六年的培养，已经有了小学文化程度的学生。小学毕业后怎么办呢？柏考虑到一部分可以用为布道员，但成绩好的还应该继续深造，将来可以为教会服务。由于当时在昭通等县没有适合的学校，便准备选择成绩好的到省外去读书。

(5) 送学生到外省读书。一九一一年，柏格理和住在石门坎的英国传教士易理番、张道惠等商议决定，由王树德带领汉语文比较好的苗族学生去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去前先在石门坎集中考试，结果确定杨荣辉、王定安、杨苒会三人赴北京求学。他们出发到了宜宾(四川)，收到电报说北京的学校已经停办，于是又转回石门坎。到一九一三年又决定派王爱福、王快学、杨苒会、王凤鸣等四人去四川成都华西中学读书，参加带领去的人有钟焕然(汉)，杨雅各等，进学校后，这些学生都用功，成绩较好，老师都喜欢。经过四年的学习，便离校返回石门坎，其中正式毕业的是杨苒会。杨与王凤鸣回后，便任石门坎光华小学教师。其余因为苗族旧有的男女关系的影响，教会排斥于外，没有任用，后来死了。教会到苗族地区后，提出了一些清规戒律，必须遵守，否则要受惩罚，开除工作，其中有一条是不许讲恋爱，违者法办。有些苗族传道员就是专门负责执行这条戒律，繁琐程度可以想见。一九一四年柏格理又派吴性纯、王霄汉去成都华西中学求学，王霄汉后来读大学未毕业休学回家，一九四三年死。吴性纯后来进华西大学读医科，一九二六年毕业后在石门坎医院工作，这是石门坎第一个大学毕业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吴在石门坎并负责学校等工作，后调昭通福滇医院任医师，一九七九年八月病故，年八十余岁。

有了正式中学毕业生，石门坎苗族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了，二十世纪初期，威宁县境，就连汉族的文化水平也是很低的，少数民族更不用说了。由于石门坎有了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声望逐渐显出。过去苗族不识字，县衙门和区、乡、保、甲的狗腿子到苗族村寨敲榨勒索时，开口闭口就是“有公事”(即公文)。只要提到“公事”二字，任何人都不敢反对。由于苗族不识字，受人欺压敲诈就更加深重。现在有了高中大学学生，是否真有县衙门的公文，一眼可以识破，于是区、乡、保、甲的恶棍不敢乱来了。这样一来，苗族都感到很幸运。觉得基督教来后帮助他们解除了一些压迫。但也由于这样，就引起了土目恶霸地主和区、乡、保、甲们的嫉恨。这些恶人正在互相勾结，准备扑灭新生的这股力量，因为如果让它成长起来，就不能达到敲诈勒索目的。而尤其土目地主所担心的是，苗族都是他的财产，可以任随摆布，现在他们读了汉书，有了知识，胆子大了，不能任意使唤了，如此发展下去，怎么得了。

更甚者，由于石门坎光华学校聘有汉族老师教书，这些老师不但能教书，还有写呈文上禀打官司一套本领。因此，地方的地主恶霸深为仇视，这些苗族现在不但在地方上可以伸腰，而且对国家形势，世界形势都知道了，因为他们从上海和外地订有报纸杂志，逐渐增长了知识，胆子逐渐大了。

(6) 宣讲医药卫生知识，废除祭鬼请巫。苗族对一切自然界都认为附有神灵，一切疾病也都是鬼怪作祟，因此，祭鬼请巫在苗族村寨里几无休止之日。柏格理见到这种情况，便利用这个机会来增加教徒的信任，扩大教会影响。一方面宣讲“信了上帝万事无患”，一方面宣讲医药卫生知识，例如：沸水消毒，避免与病者接触，外伤包敷，大量种牛痘，不要生食要熟

食，等等常识。经过这些宣传，苗族的疾病确有减少，而祭鬼，请巫也越来越少。信上帝越来越热心，到石门坎教堂做礼拜的人，几乎有一部分是为了治病拿药而来。二十年代中期后，没有免费发药了，做礼拜的人慢慢减少了。柏格理和张道惠主持教会时期，都有免费看病拿药的措施。这对妇女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妇女都有孩子，婴儿疾病较多，为了治好婴儿疾病，她们就要来做礼拜，顺便看病拿药。这时石门坎虽无正式医生，但是一般医药常识洋人传教士是知道的，为了使教徒信教热心，他们或她们都愿意多化点工夫。

偶尔有正式医生来到，不用说他们就大做文章了。约在一九二〇年前后，英人传教士在石门坎修建了一小幢平房，分为三间，放有床和桌凳，平时空着，有医生时，重病人便可住医，设备简陋，但总之是方便了群众。因为除饮食自己负责外，煤火教会免费供给，烧火打水自己出力便可解决。有正式医生来到，可以免费诊治，很方便教徒，但这个机会不多。总之，宣讲医药知识，免费治病发药，这是教徒十分欢迎的，教会旺盛时期，这项工作做得很好。

关于宣讲医药卫生知识，一方面平时对教徒结合实际教育指导，一方面是对在校学生设卫生常识课程，这样一来，效果较好。

(7) 聘用汉族传道员与教师。柏格理与苗族接触后，看到苗族没有文化，没有知识，这是他们受他族歧视，受土目地主压迫，又是胆小的一个原因。为了争取这些人信教，一开始便聘汉族传道员到苗族地区传道。一九〇五年正月，柏第一次到苗族地区，就请王老太爷，夏士元二人同去。因为汉族对中国情况熟悉，处理问题方便。随后石门坎教堂与学校建立了，经过几年，柏格理感到这个办法效果不错，汉族传道员与教师就络绎不绝地被聘去石门坎工作了。尔后虽然苗族有了高中和大学学生，但汉文应用上汉族仍然优秀，所以直到教会衰落时期，仍然留有一个教汉文的汉族老师在石门坎。

汉族布道员和教师在苗族地区做了很多工作，得到苗族的称赞和信任。特别是对付城内汉族歧视和乡下土目大地主的欺压，汉族布道员与教师都帮了苗族不少的忙。基督教未来前，苗族很少进威宁县城或昭通县城，因为怕城内汉族骂和欺负。一九一二年，柏格理带几个汉族和苗族布道员到威宁县城去，夏士元（汉族），杨雅各和王道元三个人出街买米，街上便有人指手划脚骂“苗狗×的”。夏士元立即将骂的人抓住送到县衙门，并且大声质问说：

“你们城里的人都来看，到底这是人吗是狗？”当时围了一大堆人，有的来劝说：“这个青年人不懂事”，“他错了”，“你先生饶恕吧！”随着夏士元便问：“县城里的官府是干啥子的？为何不教育城里的人，这样侮辱我们？请县官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是狗吗是人？！”经许多人来调解，事情才罢。第二天县衙门立即出告示说：“汉族、苗族、彝族皆我本县百姓；汝等城内汉民，今后切不可再侮辱人，尔后敢以狗辱人或其他侮辱人者，立即报告，当即拿办严惩。自布告日起，胆敢违者，当拿办不贷”。从此，苗族进城才没人敢骂，这都是汉族布道员的功绩。另外，如象一九〇六年，威宁附近各县苗族地区所有土目，联合拘捕，酷打苗族教徒，并大肆虏掠牲畜、粮食、财物。柏格理亲自率领布道员前去抢救，都是汉族布道员打前阵。随着又向县衙门呈书禀告，各县衙门贴出告示警告土目地主，事始趋缓，这也是汉族布道员和教师的功绩。曾在石门坎教会工作过的汉族布道员和教师共十五、六人，名如后（译音）：

李司提文、李四先生、王老太爷、夏士元、
付章正、郭明道、钟焕然、刘映三、

刘四、马才富（回族）、王开阳、侯金堂、杨正隆、胡开英、张中普、

以上十多人，有的既是布道员又是学校教师，有的只担任一项工作。另外有少数个别不是教徒，只是教师，如刘映三，刘四。由于这些人对石门坎苗族有过帮助，年纪稍大的苗族教徒对他们很有感情。

（8）圣道公会，内地会划分区界及其策略。一九一四年，石门坎教会正是兴盛时期，安顺内地会的葛布分堂，信徒也大大增加，柏格理和党居仁为了方便传教，于是决定商讨如何划分布道地区界线，以利于发展。党居仁带青年英人斐忠谦，柏格理带青年英人王树德同在大松树集会，（今威宁自治县大街区所属）。这里有内地会一个支堂，两边商定：以勺甫山梁为界，内地会传教界线为此山梁的东面及南面。圣道公会为西面及北面。虽然都是基督教，但教派不同，在布道方法及讲述道义也不相同。据说划分界线后工作方便，而实际上这就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表现。这个界线的划分一直到解放时依然如此。但教育上，学校方面并未受此约束，自一九一四年以后，内地会教徒的子弟到圣道公会学校读书的很多，因为圣道公会学校比内地会办得好。不仅有小学，后来又办了初中。因此，内地会读中学的几乎全部都进圣道公会学校。圣道公会与内地会不但讲述道义上有区别，即是对待教徒的策略上也不相同。据老年苗族布道员揭露，两会洋人牧师曾经交换过关于办教会经验。圣道公会洋人以为应提高教徒的文化水平，增加其知识，使他们与外界接触，以至到外国去留学，然后他们才肯信教，才忠于教会。内地会洋人则相反，认为提高了教徒文化水平，他们有了知识之后，就不愿再回本地教会来了，所以培养苗族学生读书，只能到他们可以读圣经，唱赞美诗的程度为止。直到解放前夕，我们从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老年苗族教徒揭露的是事实，据粗略估计，解放前，循道公会石川联区苗族曾进小学以上的人约有一万二千左右。知苗文的约三分之一，但内地会则大少于此数。又前者高中及大学毕业生就不少，（大专水平的约三十人）后者高中生也没有。到解放初期，两个教会教徒表现的行动，也说明了这一事实。

两个教会，两个策略，我们从昭通教徒情况也可以看出来。柏格里到昭通，就找汉族教徒李司提文教他的汉语汉文，同时柏又教李的英语英文，以后李司提文英语程度很好。在同一期间，李的妹（称为李小娘，名李多加），也学英语英文，后来到英国游历而回。她回昭通后，生活及活动都常与英人女传教士在一起，颇得信任。两个教会，两个办法，但目的同一，一是愚民政策，一是诱惑政策，都是为了争取教徒，以利侵略。

（9）柏格理其人，被打、染病及死去。柏格理原名撒母尔，英格兰人，中学文化水平，家庭为工人。一八八七年与邝慕廉同来中国，到上海后，去安徽安庆学汉语汉文，半年后，始来昭通，柏数学很好，汉字书法也好，爱好中国文学，喜读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认真学汉语汉文，到昭通后即与汉族上层人士密切交往。柏格理初到昭通传教，信徒很少，他学了汉语汉文能与汉人接近，但初时有人还要杀他，据传，想杀柏的人并非遥远，而是经常接触的人。由于柏耐心的劝说，结果想杀柏的这个人便信了教，而且很热心，后来随同柏到苗族地区传教，并在石门坎做了许多事，对石门坎教堂的建立出了力。柏为了发展教会采取各种措施，进入苗族地区后，一开始就认真学苗语，后来帮助创造苗文，办学校，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他还与苗族同吃饭，穿苗族服装。在柏所写有关石门坎教会的文章（英文）中，附有不少柏穿苗族服装的照片。柏并在石门坎设有免费的简易医务室，为患病教徒诊治发